沉着应对中美战略层面的经济竞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正将中国推到与美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前台。欧元命悬一线，美国量化宽松的连续出台，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这都是美国在力量相对削弱的情势下试图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安排。中国作为美国认定的高价值竞争目标，决不能简单地适应国际规则，而应远图长虑，拿出一套前瞻性的国家竞争战略，切实提升战略层面的经济竞争力。

章玉贵

在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经济风险依然上升的今日世界里，冷静观察重大经济问题背后潜藏的战略动因，尤显必要。

日渐诡异的全球金融竞争

先看依然命悬一线的欧元，今年以来，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领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求解主权债务危机中，只是迄今收效甚微。欧洲最新的自救动作是启动了救助资金高达7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ESM），以防区内经济大国西班牙经济最终雪崩。不过，要拯救悬崖边的欧元体系，单靠砌好这堵金融防火墙是远远不够的。谁也不能保证欧元体系危机能够峰回路转。

云集了最多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欧元区，居然在欧债危机面前难以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真是今日世界的一大经济之谜。或许，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看来，建立欧元区中央预算是一帖良药。不过，笔者判断，作为欧元区内最具救助实力也最具经济理性的德国，是不会拿国运做赌注的。笔者曾说过，当雄心勃勃的欧陆国家希望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强化自己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的时候，美国发现，不仅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更多国际经济责任的欧洲是最大威胁。偏偏欧元设计存在固有的缺陷，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济学家就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情况下的经济对策提出最优解。而发端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通过极为畅通的金融传导机制很快在欧洲产生了“达尔文主义”式冲击。由于希腊、西班牙等薄弱链条的拖累，使得表面强大的欧元区经济在应对危机冲击时显得异常脆弱。于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欧元，在高盛、标普等冰冷手术刀的改造下，居然演变成为欧陆经济的最大“短板”。

另一方面，作为此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自危机发生以来则一再推出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早先的债务上限谈判还是已经连续三轮的“量化宽松”（QE）政策的祭出，本质上都是美国吃准全球经济对美元的依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外转嫁风险并向各国分摊危机成本的掠夺性政策安排。偏偏在既有的秩序框架下，美国在推出上述经济政策时很难受到强有力的约束。换句话说，由于全球欠缺一个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握有金融主导权的美国何时祭出怎样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本质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执政当局的政策偏好。不过，吃尽了美元红利的美国应当明白，美元地位正在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这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森格林教授日前即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警告：美元地位岌岌可危。

美国多维手段恢复竞争力

不过，世人应当明白，一向最能把握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的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其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在制造业领域，美国一改过去有舍有弃的发展战略，而是变得格外“斤斤计较”。笔者预估，美国正在实施的“重回制造业时代”的相关策略安排，即便暂时无法令美国夺回全球制造业的龙头老大地位，也会进一步强化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如果由美国发动的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能够取得实质性突破，则美国有可能打造出自汽车之后的另一个超长产业链，并借此在占据此次产业革命制高点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分工与财富版图，进而为美元的霸权地位提供实质性支撑。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来强化美元地位。我们很难说是美国一手引爆了欧元危机，但是通过这场危机，欧元短期内再难挑战美元。假如欧元体系当真崩溃，或者一直不死不活，则由英国配合、美国主导的此轮全球金融洗牌，既达到了洗劫欧元，顺势强化美元地位的目的，也将使美国能够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意欲扩充行为空间的人民币形成打压态势。偏偏在知己知彼方面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软肋看得一清二楚。财务报表看起来不错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尚在发育中的金融市场体系更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假如美国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一旦其构筑了针对中国的金融包围圈，加上高技术产业的上游锁定，则中国将在中美核心利益博弈中更显被动。

中国已是高价值竞争目标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正将中国推到与美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前台。欧元命悬一线，量化宽松的连续出台，推动制造业回流，等等，均是美国在力量相对削弱的情势下试图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安排。中国作为美国认定的高价值竞争目标，决不能简单地适应国际规则，而应远图长虑，拿出一套前瞻性的国家竞争战略，切实提升战略层面的经济竞争力。

在全球金融面临大洗牌、新产业革命正在孕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构筑能够全方位参与金融竞争与产业分工的种子选手，迫切需要总结以往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把握产业与技术变迁趋势，以制度创新和人才培育为牵引，构筑中国的“经济与金融高边疆”，从而有效维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在全球经济秩序变迁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与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国家战略，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以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为核心，合理整合国家的经济与技术资源。既要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又要在战略转型中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分工。

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在金融服务优势与新技术产业化结合方面形成的丰富经验，在关键经济领域收复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主导权。同时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焦点评论

新一轮贸易摩擦袭击“中国制造”

欧美经济不景气，中国制造受攻击。
贸易摩擦多借口，双反诉讼很扯皮。
光伏领域承重压，汽车行业有寒意。
贸易保护危害大，最终损人不利己。

ICLONG/漫画
孙勇/诗

■算法经济 Li Bin's Column

房产税并无不可行之处

李斌

房产税孕育了好几年，大家都以为快要分娩了，反对之声现在却骤然升起，而且传出官方减缓步伐的消息，一些人甚至建议取消这个计划。看来，房产税还大有讨论的必要。鉴于郎咸平教授是本次反对声浪的领袖，其影响力很大，我们不妨先来讨论他的观点。

郎教授的相关观点包括以下几条：1、房产税加重老百姓负担。2、房产税会导致税务人员随意对房屋估价，引发腐败。3、房产税管住了房价，则将诱发通胀，引起经济崩溃。4、保障房比例应大幅度提高，商品房则应任其涨价，用来自后者的税收补贴前者。

郎教授似乎未能搞明白业已形成较大范围共识的这个叫做“房产税”的税种的性质，而把它简单等同于美国的房产税。大家所讨论和主张的这个“房产税”，是指在扣除一定的人均免税住房面积之后，针对超额住房面积在其持有期间所征收的税，相当于一种消费税或奢侈税，其目的在于抑制房屋囤积炒作，促使空屋业主尽快卖出房屋，最终有利于节约耕地。因此，实际上它与大部分只拥有自住房屋的居民无关，不对他们构成财务负担。这个税种只与少数人有关。这与美国对每栋房屋普遍征收房产税的做法是非常不同的。这一点尤其要提醒郎教授注意到。

郎教授对房产税的“炮轰”文不对题的另一点，就在于所谓“房产税引发腐败”的观点。这一提醒当然是有益的，可是，他忽略了，美国家庭的房产主要是独栋建筑，每栋建筑各有特点，彼此之间可比性差，所以才需要由税务人员一栋栋地估价；而我国目前仍以小区公寓楼为主，一个居民小区的房屋估价，必然是集体进行的，是由税务机关统一操作的，不会任由哪个专管员与业主单独进行私密交易。很难想象，一个业主会为了使整个小区降低税负，而去单独贿赂税务人员。任何税收都可能引起腐败，房产税所引起的腐败不大可能更为严重，刻意强调它则是耸人听闻的。

“房产税将引起经济崩溃”的议论令人费解。首先，郎教授认为房产税会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彻底压制房价的上升，这等于承认房产税在达成调控目标上具有决定性的效力。然而，他不满足于这个效力的达成，因为他认为，资金从房地产领域的撤出，必将致使实体经济投资过热，引发通货膨胀，进而造成大崩溃。这一观点同他一直以来认为“资金从制造业转移到资产炒作领域是中国经济巨大危险”的观点相互矛盾。房地产的泡沫消除了，房价、地价下降了，则制造业的成本也就降低了，投资环境也就好转了，这时资金回流制造业，不正好一拍即合吗？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整体经济的向下运动，这具有引起阶段性衰退的趋势，这是一种常识性观点。可是，他说“中国经济完了”原来竟然不是出于这种衰退，而是由于经济过热和通胀所引起的。从房地产撤出来的资金竟然具有这么大的威力，不仅可以立即抵消衰退，而且还可以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因为只有这样的通胀才可能导致崩溃）?！这怎么可能呢？请不要忘记，不超过3%（假设这是房产税率）的年持有成本增加额不可能完全阻止投机资金回流房地产；在此情况下，通胀要变得那样严重，除非一条蛇突然变成了四条蛇。

鉴于此“崩溃”的前景不妙，郎教授进一步的建议是，房地产泡沫干脆就不要治理了，不如学习新加坡和香港的做法，更加大规模地建设保障房（覆盖面达到50%~85%），同时对商品房市场则听之任之。

我首先要来反驳这个“听之任之”。在现行的体制下，影响房价的众多关键变量（土地供应，按揭贷款比率等）都由政府控制，这时，政府是无法“听之任之”的。这就好比货币发行一样，政府必须有个态度，有个政策，有个倾向。简单地放任自流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在操作层面也是无法实行的。

其次，大陆型经济的治理与港口型经济是非常不同的。新加坡和香港的地域极为狭小，已无土地储备，只能在那一点点土地上兼顾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目标，由政府向普通民众提供公屋也就成为迫不得已之举。这绝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反之，我国大陆具有辽阔的土地面积，城市化方兴未艾，包括土地供应在内的相关经济变量都具有充足的弹性，而适当的经济调控手段尚未充分施展，怎能轻易采取这种极端措施呢？本栏目已反复说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秘密，就隐藏在土地供应之中；正是因为几个简单的数字和道理彻底搞错，方才造成如此巨大的泡沫。如果不放眼国土数量、农地占用、农村宅基地、粮食政策、国际粮食市场等广泛的问题，不可能真正理解过去这么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据郎教授的言论记录来看，这些问题恰恰是他所严重忽视的，所以他的结论也就不可能正确。

鉴于房产税如此容易引起误会，笔者建议可以将之更名为诸如“房产消费税”或“超额房产税”之类的名称，以区别于现行的“房产税”。一些人说它实行起来很困难，在笔者看来，情况恰恰相反，这个税种其实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房产不同于别的资产，它是一种需要经过在政府部门依法登记才能成立的财产。相应地，“房产消费税”所涉及的问题便是“房屋数据库”与“人口数据库”之间的关联和对应的问题。经过一次性申报之后，以后的年份中只需要根据往年记录并结合房屋购买、交易、过户和人口变动等手续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即可。只要充分运用智慧和科学手段，它一定是可以顺利实施的。

就房地产调控而言，“房产消费税”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其“性价比”是最高的，所以，在各种政策组合中它应当位于最为优先考虑实行的措施之列，这一决心绝不可以动摇。相反地，应当以实行“房产消费税”为契机，清理和调整其他各项现行的政策，大力进行其他有关税费的减免。为了减少推出这一税种的阻力，还可以考虑对依法不能出售的福利分房予以豁免，即在计算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时，福利分房应当纳入计算，但在缴税时，根据这一税种的目的，如果超额面积是福利分房（相关计算应先计算福利房面积，再计算商品房面积），按照有关规定它不得出售，则可免除其纳税义务。

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部门在“房产消费税”问题上犹豫不决，相关试点工作思维不清，组织混乱，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有关部门显然没有理解公众所达成的是什么样的共识。假如是因为地方税收收入减缓，以致要增加新税，聚敛钱财，那么大家所说的就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税种，既然目的不明，为什么还要进行试验呢？试验什么呢？其次，现有的两个试点，其方案不仅互不配套，而且均不符合该税种的基本设想。上海方案稍微靠谱一点儿，可是，它不涉及存量房屋，就不触及这一税种的实质，怎么可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呢？如此微弱的增量调整怎么可能触动整个市场呢？如果以摸索征管方法为试点目的，就应当选取规模较小的城市来迅速取得经验，试点本就不应当在大城市进行。看来，整个市场这几年耐心地“等靴子落地”是白等了，这纯属浪费时间。简单的事情可以在这个年代演绎得无比复杂，信夫！

■舆情时评 First Response

我们一起期待和吐槽过的创业板

苏容若

创业板3岁了。作为一个3岁的孩子，它既被寄予压力山大的期望，也收获无数吐槽。无论如何，它一天天在长大。

关于创业板的吐槽又多又狠，情绪激昂，真想问问元芳怎么看。试说一二：想想大股东套现对股价的打击，其实那些上市后身价动辄数十亿的老总很难把那个高高在上的数字悉数换成真金白银；想想那些被控诉的高市盈率，总对应着那么一群也许太自信也许不够淡定的新股投资者，不知有没有令投资者保护狂热者恨铁不成钢并偶感精神分裂；至于传说中作为唯一为创业板买单的投资者，鉴于投资者群体太大，赚了钱的投资者很可能在旁偷乐无暇参与控诉，咱也不好随意代言。

笔者承认，创业板很难说是个优等儿童。只是，创业板是否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股票市场的供需失衡、部分投资者的欠理性、发行人的造假冲动、中介机构的尽责归位不够，如此等等。创业板之痛，绝大多数并非仅仅来自创业板的土地，而在那片更为广袤的土地上，生出创业板来，未尝不是一步前行、一种治疗。创业板这么一个市场，自起意筹备至正式推出，历经约10载。至正式推出之时，力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各种举措，深意不少，依然迎来了市场劈头盖脸的洗礼。

在一个还不够成熟的市场上期待白马王子的横空出世，总归还是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还是从小马驹开始成长来得踏实。望之深，责之切，如果换个平常心来看呢？第一，创业板这个市场，进来的是某些特定行业和特征的企业，波动、风险与收益并存；第二，如果出现有强烈造假冲动与精良造假技术的企业，加上铤而走险的中介机构，未必可以被精准识别并拒之门外，未必能杜绝中国的“安然”；第三，这市场上有一群狂热的投资者，会给出狂热的价格，因此也许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冷静；第四，和其他股票市场一样，这里不是只赚不赔的，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作为一名曾经的股票小散，笔者从未投资过创业板，也从未申购过新股。为什么？研究不多，缺乏兴趣，主动远离，以图安眠。每当见小散谈及市场环境太差、股票投资亏损，笔者总想问问，为了这笔投资，请问您花了几多时间几多精力？当然不是说研究一定带来盈利，只是怨天尤人的情况太常见。

看看这3年多少投资者擦肩而过的创业板牛股，如蓝色光标、易华录、富瑞特装、聚龙股份等。这些创业板股票的机会曾经摆在每一个投资者的面前，不问来人是谁，一律平价出售。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仅好吐槽而不喜自省者是会扪心自问，还是会继续吐槽呢？

笔者写下以上段落，内心已未免忐忑恐犯众怒，却也实在不吐不快，可见吐槽实在是一桩畅快事。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居民收入增长跑输“大市”格局应该改变

陆杨

与股市中的广大散户奋斗者类似，居民在整个社会分配体系中的增速同样处于“跑输大市”的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8倍。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了4.5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3.6倍，增速均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一数据与之前公布的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中占比逐年下降的数据基本一致，居民的收入增长非但未能跑赢大市，相反还大幅落后于市场整体一般水平。即与GDP增长3.6倍相比，居民收入增速仅为其一半。这一宏观上悬殊的比例表明在过去10年间，社会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分配到居民部门之外，考虑到公共财政收入增长达4.5倍，那么至少可以认为政府部门的收益是远大于普通居民的。事实上从每年的增长速度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年均增速仅为10%左右，而公共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则高达20%以上。

这一收入分配格局与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在过去10年中政府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这两大引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钢铁、造船、化工和水泥等等，甚至包括包装成高新技术产业的光伏原材料粗加工行业。这些行业运作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在其中通过金融系统将居民部门的部分收益转移到企业和政府部门，以此推动企业和经济快速发展，并间接解决就业和收入增长。

这一模式除了资金的大量投入之外，还需要得到廉价劳动力的支持。譬如造船这样的行业，如果没有低成本劳动力的支持，则很快面临产地转移的问题。因此，政府在发展这些产业的时期并不愿意过快地提高劳动力成本，否则产业和财税的发展必定会受到较大的限制。这也是为何10多年来工资收入上涨迟缓，部分打工者收入甚至未有变化的根源之一。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比较适合经济发展的粗放阶段，且具有增加寻租机会、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巨大负面作用。如果不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及时做出调整，恐怕会对未来的经济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与收入相关，实际上却与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分配制度相关。按照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和经济运行模式继续运转，那么问题很可能会逐步积累。

虽仍未到积重难返之境，但也需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从及早动手、有备无患的角度出发，应尽快解决宏观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性和协调性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宏观方面，消费一般是经济增长主导力量，而投资和出口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收入分配方面，居民个人收入增速一般与经济增长基本持平，甚至略高。

而产业投资领域，则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为主。服务业虽然规模巨大，但绝大部分仅仅是从属地位，核心仍然是高科技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偏向于中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制度，西方国家政府将高科技企业的部分收益转移给普通工人，再通过发达的服务业体系，将工资性收入进一步转移给数量庞大的服务业劳动力。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少数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基本也属于这一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模式。

这一模式对我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解决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在兼顾收入分配公平，核心高科技产业持续增长的条件下，经济与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保证，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